

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

52

宋元话本

张兵 著
◎ 春风文艺出版社

06
:52

学术顾问

季羨林

钟敬文

启功

程千帆

丛书策划

侯忠义

杨爱群

特邀编审
(按姓氏笔画)

宋加哲

张俊

张国星

林辰

侯忠义

欧阳健

高翔

董文成

傅憎享

薛勤

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

宋元话本

张兵 著 ● 春风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宋元话本/张兵著. —沈阳:春风文艺出版社, 1999. 1

(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)

ISBN 7-5313-2007-X

I. 宋… II. 张… III. ①话本小说—文学评论—中国—宋代②话本小说—文学评论—中国—元代 IV. I207.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34753 号

宋元话本

张 兵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辽宁建平兴海打印中心制版

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字数: 61 千字 印张: 3 1/2 插页: 2

印数: 1—8,000 册

1999 年 1 月第 1 版

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杨爱群

王维良

王 颖

责任校对: 唐惠凡

封面设计: 杜凤宝

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ISBN 7-5313-2007-X/I·1745

本册定价: 6.00 元 总定价 (全 100 册): 600.00 元



张 兵 1947年5月4日生，上海市南汇县人。1982年1月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，在《复旦学报》(社会科学版)编辑部工作至今。现为副编审兼复旦大学古籍所副教授。在编辑工作之余，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，已出版《话本小说史话》、《凌濛初与〈两拍〉》、《文康与〈儿女英雄传〉》、《宋元话本赏析》、《历代传奇选》、《中国古代梨园百态》、《宋词平说》等多部专著、主编《文学人物鉴赏辞典》等。发表论文一百五十余篇及各类文章二百多万字。并整理校点古代小说近一千万字。已出版《古今小说》、《警世通言》、《醒世恒言》、《绣像阁》、《仙侠五花剑》、《古本乾隆外传》、《雨花香》、《通天乐》、《金瓶梅词话》(与人合作)等十多种。

目 录

引 言/1

一、话本和“说话”/2

二、宋元话本的雏型——唐话本/8

三、北宋的“说话”和话本/16

四、南宋小说话本概观/25

五、小说话本的艺术体制/31

六、南宋小说话本的分类/39

七、南宋小说话本的艺术特征/51

八、南宋“说铁骑儿”话本/60

九、南宋的讲史和说经话本/65

十、元代的“说话”和小说话本/71

十一、元代讲史话本/85

十二、宋元话本的深远影响/105

引 言

本世纪二十年代,鲁迅先生在论述我国小说的发展历史时,曾说过:“总之,宋人‘说话’的影响是非常之大,后来的小说,十分之九是本于话本的。”他所说的“话本”,就是本书所说的“宋元话本”。它是我国古代白话小说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锁链,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广泛而持久的影响。和诗、词、文、戏曲等几可并驾齐驱,成为宋元时代的重要文学体裁之一。有人甚至把话本发达的宋元时代称为“平话”的时代,可见它在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。鲁迅还说过:“我相信,从唱本和说书里,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、佛罗培尔(福楼拜)的。”这一预言,在今天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。它激励着我们要对宋元话本作比较深入的研究。

一、话本和“说话”

什么是话本呢？

话本是我国唐、宋、元时期人们对兴起于城市都会市井间的“说话”艺人演唱时所用底本的一种文体称谓。它萌生于唐代，迅速崛起于宋元时代，至明清时期，又演变成“拟话本”小说。话本的“话”，就是故事，“说话”，就是讲故事。

“说话”是我国古代讲述故事的一种技艺，相当于现代的说书。那些演讲故事的艺人，就叫做“说话人”。他们在演唱时所用的底本，就叫做“话本”。

话本之“本”，是指故事的底本，类似于演剧的底本被人称为“剧本”一样。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冯梦龙在《〈古今小说〉序》中说：“泥马倦勤，以太上享天下之养，仁寿清暇，故阅话本，命内珰日进一帙，当意，则以金钱厚赠。”这里所说的“话本”，显然就是指故事的底本，它是抄在“帙”上，由供奉局献给天子以“阅”的。

话本最初又名“画本”。现存敦煌文献中，如《韩擒虎话本》的结尾就有“画本既终，并无抄略”

之类的话。可见所谓的“画本”，大约是指挂在墙上或公共场所，供寺院中的僧人向群众宣讲宗教故事时所用的图画。它有某种特定的故事内容，僧人凭借它可以更有效地提高听众的兴趣，达到宗教启蒙的最佳效果。它的作用大概和今天的连环画相似。

最早出现“话本”之名的，是南宋时期耐得翁的《都城纪胜》一书。他在《瓦舍众伎》条下说：

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故事，铁骑公案之类，其话本或如杂剧，或如崖词，大抵多虚少实，如巨灵神朱姬大仙之类是也。影戏……其话本与讲史书者相同。

可见，在当时话本并不仅仅是指“说话人”的底本，也泛指部分伎艺如傀儡、影戏等艺人们用以表演的底本。但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各种伎艺间的分工日益精细，话本的涵义也渐趋明确。近人陈乃乾先生在《〈三国志平话〉跋》中，曾对“说话者”和话本有过一段很精彩的说明：

我国宋元之间，市井间每有演说话者，演说古今惊听之事。杂以谑语，以博笑噱；托之因果，以寓劝惩，大抵与今之说书者相似。惟昔人以话为主，今人以书为主。今之说话人弹唱《玉蜻蜓》、《珍珠塔》等，皆以前人已撰成

之小说为依据，而穿插演述之。昔之说话人，则各运匠心，随时生发，惟各守其家数师承而已。书贾或取说话人所说者，刻成书本，是为某种平话。

这段话相当清楚地说明了他对话本的认识。

第一，话本是市井间“演说话”的讲唱文学，表演的主要内容是“古今惊听之事”，也就是历史上那些波澜壮阔、叱咤风云的事件和传说故事以及发人深省、富有教育意义的社会现实新闻。

第二，话本的创作动机，主要有二：一是娱心，“杂以谑语，以博笑赚”；二是劝诫，“托之因果，以寓劝惩”。

第三，话本与说书的关系相当密切。“今之说话人”所演出的各种节目，如《玉蜻蜓》、《珍珠塔》等，“皆以前人已撰成之小说”，也即话本为依据而穿插演述之，可见两者如水乳交融般的不可分离。

第四，话本的流传，主要靠师承和坊刻。话本最初是“说话”艺人自己当作秘本使用的。惟各守其家数师承而已。“说话”艺人拜师学艺，世代相传，在此过程中，师傅往往也把话本当作维持生计的财产留给徒弟使用。尽管各门徒在演述时，“各运匠心，随时生发”，根据听众的审美情趣，对底本时有各种创造性的发挥，但都秘不示人。只是天长日久，几经辗转传抄，才有可能流落社会，后被

人公开出来。宋元时期,“说话”受到市民的普遍欢迎。书坊主人见有利可图,就“取说话人所读者,刻成书本”,在坊间流传。有的书商文化程度较低,就邀请一些文人将这些话本整理加工,甚至重新编写。经过一番“脱胎换骨”之后,话本的艺术水平就大为提高,传播也更为广泛了。

“说话”作为伎艺之一,和我国早期的优伶有关。在古优们娱人的俳笑取乐中,孕育着“说话”的某些艺术因素。如刘向的《列女传》中《母仪传·周室三母》说:“古者妇人妊子,寝不侧,坐不边,立不跛,不食邪味,割不正不食,席不正不坐,目不视于邪色,耳不听于淫声。夜则令瞽诵诗,道正事。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,才德必过人矣。”这说明,周初时已有瞽者对人“诵诗,道正事”了。这里所说的“诵诗”,是指吟唱诗篇,而“道正事”则显然是指瞽者在吟唱诗篇后再讲述有关故事。《列女传》中的妇人遣闷。从文中来看,这位瞽者讲述的故事属于“正事”,也即统治者所提倡的“妇德”。不可否认,后世“说话”的雏形,至此已初露端倪。

“说话”的萌生大约在秦汉时代。地主阶级在建立封建的中央集权以后,在物质上基本满足了穷奢极欲的需求,转而开始追求精神享受。《汉书·礼乐志》说,当时皇帝朝贺时,在前殿房中置酒作乐,有倡优和象人侍候,成为朝廷的“弄臣”。他们出入相随于皇帝和贵戚们,在宫中发挥各自的艺术专长,向统治阶级献媚邀宠。汉代

的张禹，就是这些“弄臣”的代表之一。他“性习知音声，内奢淫，身居大第，后堂理丝竹管弦”，整日与弟子相娱。在后宫时，经常与“妇人相对作优，管弦铿锵，极乐，昏夜乃罢！”封建统治阶级的追求声色逸乐，是我国“说话”和其它伎艺滋生的温床。在民间，“说话”也得到人们的重视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如淳注说：“主者欲知里巷风俗，故之稗官使称说之。”那些“稗官”们从闾巷市井间采撷到各种“丛残细语”，就向皇帝“称说”。而在这类“称说”的材料中，有不少是有故事性内容的。这对“说话”伎艺萌生的影响较大。当古代的优人们一旦从稗官的活动中获得启示后，原先流行于闾巷市井间的“谈论故事”，就会有意识地从不自觉逐步向自觉方向发展。尤其是“瞽”等各种丧失劳动能力的人，不能像其他优人一样去从事较为复杂的表演，如歌、舞、乐等艺术活动，而故事的讲述则是一种十分简单易学的伎艺，非常适合于他们的表演。除瞽者以外，还有侏儒也是从事“说话”的一支重要力量。他们乐此不疲地将“说话”视作谋生的重要手段，促使职业化的“说话”伎艺在民间悄然滋长。1957年在四川成都天回镇的汉墓中发掘到的一具东汉“说书俑”，以及1979年在扬州邗江胡场一号的西汉木椁墓中发现的“说书俑”，都可为汉代“说话”的萌生提供有力的例证。

“说话”的迅速发展，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。

《三国志·魏志》卷二十一《王粲传》裴松之注引《魏略》中说，聪明绝伦的曹植，在邯郸淳面前可以背诵“俳优小说”数千言。这种小说既然可以背诵，表明它和当时的“说话”有着密切联系。《南史》卷六十五《始兴王传》中说，南朝的陈始兴王叔陵，“夜常不卧，执烛达晓，说人间细事，戏谑无所不为”。这是“说话”的一种早期形式，也是我们目前能见到的有关“说话”的最明确的文字记载。

二、宋元话本的雏形——唐话本

我国小说的历史源远流长。唐代之前的小说，被人称为“文言小说”。唐代传奇的出现，开创了小说前进的新时代，但它仍未脱离“文言小说”的范畴。而作为植根于市井、与普通民众休戚相关的“白话小说”之兴旺发达，文学史家公认为是宋元时代，其主要标志就是话本的崛起与飘进。然而，宋元话本也非空穴来风，其源实缘于唐代的话本。

唐话本的萌生，与隋唐时代“说话”的勃兴息息相关。现存《太平广记》卷二四八引侯白的《启颜录》说：“白在散官，隶属杨素，爱其能剧谈。每上番日，即令谈戏弄。或从旦至晚，始得归。才出省门，即逢素子玄感，乃云：‘侯秀才可以（与）玄感说一个好话。’白被流连不获已，乃云。”这是一则有关隋代“说话”的重要资料。这位侯白，虽然不是职业的“说话”艺人，但“好俳优小说，人多爱狎之，观者如市”，在众人中有较高威信。一天，杨素的儿子在路上遇到侯白，便迫不及待地拉住他，央求“说一个好话”。于是，侯白讲述了如下一则动

听的故事：

有一大虫(按：指老虎)，欲向野中觅肉，见一刺猬仰卧，谓是肉羹，欲衔之，忽被猬卷着鼻，惊走，不知休息，直至山中。困乏，不觉昏睡，刺猬乃放鼻而去。大虫忽起欢喜，走至橡树下，低头见橡叶，乃侧身语云：“旦来遭见贤尊，愿郎君避道。”

由这则故事可知，隋代的“说话”在形式上和“戏弄”，也即“百戏”较为接近，内容大多是即兴表演的笑话之类。不过，前述引文中的“与玄感说一个好话”的内容尚可得知，它在“说话”演进中的意义值得注意。

“说话”作为一种伎艺的名词，正式出现在唐代的典籍中，表明唐代的“说话”已渐趋成熟，有许多新的特点。

其一，是它已发展成一种独立的、专门的娱乐活动。郭湜的《高力士外传》说：“太上皇移仗西内安置。每日，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，芟薙草木；或讲经、议论、转变、说话，虽不近文律，终冀悦圣情。”由此可知，“说话”已和讲经、议论、转变等并列，成为一种为人所喜爱的独立而专门的伎艺。

其二，是“说话”内容的故事性较强。在上引资料中，高力士所讲述的内容看来比较生动有

趣，最终竟能打动“圣情”——皇帝的心灵。《太平广记》卷二百五十一《嘉话录》中著录了中唐诗人刘禹锡讲述的一则故事，倘将它和侯白所“话”的内容相比，就会发现中唐时代的“说话”已从先前即兴的插科打诨中脱胎而出，故事较为完整，且有一定的情节，和后世的话本有密切的联系。在艺人的长期演出实践中，它被反复修改加工后题为《虎媒记》、《虎报恩》、《大树坡义虎送亲》等，辑入著名的《醒世恒言》中。

其三，是“说话”已不局限于皇宫内院和贵宅私邸，它的听众，也转为普通的“市人”，即市民。段成式的《西阳杂俎续集》四《贬误》所记，有“市人小说”一语，它即是民间“说话”艺人讲述的故事，常在人的生日等节庆时演出，地点多数在民众聚集的露天空地，如街头巷尾或茶肆酒楼等。大凡人群聚集处，大概不难见到“说话”表演者的身影。

其四，是“说话”已相当流行，深受民众的喜爱。《唐会要》卷四说：元和十年，“韦绶罢侍读，绶好谐戏，兼通人间小说”。人间小说就是民间小说。皇室宫廷人员如此，社会地位较低的妓女也不例外。孙棨《北里志·序》说：“其中诸妓都能谈吐，颇有知书言话者。”谈吐和言话是“说话”之意。除了歌、舞、乐之外，唐代的妓女还兼表演“说话”，可见唐代“说话”的勃兴。

隋唐“说话”的勃兴，直接催生着话本的诞

生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“俳优小说”，一旦遇到适宜的土壤，就会萌发新芽。而伴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，在唐代的寺院中又盛行着通俗说唱体的“俗讲”文字——变文，更和话本交相映辉，带来了唐代白话文学的新气象。

由于历史资料的匮乏，加上对话本判别的标准在把握上的差异，人们对敦煌文献中的存世话本还有不同认识。不过，《庐山远公话》、《韩擒虎话本》、《唐太宗入冥记》、《秋胡》、《叶净能诗》（一说作《叶净能话》）和《师师漫语话》（又名《不知名变文》）等六篇小说，以及已经佚失但大致可以窥知其内容的《一枝花话》，基本上可以确认为是唐代的话本，而其它一些作品是否属话本，还有待探究。在现存的六则话本中，《唐太宗入冥记》、《师师漫语话》、《秋胡》、《叶净能诗》四则已残缺不全，《庐山远公话》基本完整，惟有《韩擒虎话本》属于“完璧”。这两则小说可视为唐话本的代表作。

《庐山远公话》是敦煌文献中惟一的一则在标题上注明“话”的小说，乃唐话本存世的可靠资料。话本的主要人物是远公，即惠远（一名慧远），在历史上实有其人。他是东晋时期的一位高僧，精通儒学，“博综六经，尤善老庄”，被人尊为净土宗的始祖，对后世影响很大。《庐山远公话》是唐代的佛教徒藉惠远的事迹来宣传佛教义理的一个话本。作者用两万余字的篇幅，相



唐话本《庐山远公话》首段（伦敦藏斯二〇七三号）

当具体地描绘了惠远一生“说法”的主要经历，不仅对他推崇备至，而且还打上了唐代社会现实生活的烙印，讲了大量的佛家义理，表明当时普遍存在着的崇佛尊道的社会风气。话本中出现的人物，上自皇帝、宰相，下至市人、民众，包括盗贼、鬼神，无不视佛教为神明经典，顶礼膜拜。惠远一路逢凶化吉，也全仰仗他有“说法”的看家本领。《庐山远公话》不仅篇幅长，容量大，情节较为复杂，而且人物众多，场面壮观，话本的各种艺术特征已基本具备。作品中的奴隶交易，强盗行军及和尚说法等描写，都十分传神。这在萌芽期的话本中是出类拔萃的。